

基于知识契合的经济学发展 历程及其问题

——兼论经济学帝国主义运动的误区

朱富强

(中山大学 岭南学院, 广东 广州 510275)

摘要:契合是社会科学理论体系建立和发展的基础,但现代经济学的发展却与社会科学其他分支逐渐割裂,从而导致了经济学的日益贫困化。同时,当前的经济学帝国主义运动也是单向度的:一是包括数学、物理学以及生物学等自然科学向经济学单方向扩展,是经济学借鉴甚至搬用这些学科的基本方法;二是经济学根据自己固有的假设将从自然科学搬来的方法再一次扩展到其他社会学科,从而将其他社会科学的传统领域纳入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因此,经济学帝国主义运动并不是真正的契合式发展,相反会造成经济学理论进一步狭隘和僵化。

关键词:契合;方法论;经济学帝国主义

中图分类号:F0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952(2011)04-0080-12

一、引言

一般来说,知识的继承和综合即契合是社会科学理论发展的基本途径和方向。究其原因,社会关系中的人类行为不能割裂,同一个人的思维方式往往具有一致性,因而其所有行动或选择也必然基于同一种行为机理。这种契合对现代经济学的发展尤其重要。事实上,正因为社会经济现象本身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要真正形成对社会现象更具解释力、分析力的研究思维和理论观点,就有赖于社会科学各分支学科之间的互补和交叉,这就是契合的基本要求。对经济学的发展来说,尤其要注重吸收社会科学其他分支所积累的知识和发展的思维,经济学者也应拥有社会科学其他分支的广泛知识。从经济学说史的角度看,那些关注社会经济问题并对经济学发展产生巨大影响的经济学大师如斯密、西斯蒙蒂、穆勒、马克思以及马歇尔等都拥有非常广博的知识素养,他们都能够将社会科学各领域的知识有机地结合起来。同样,在现代经

收稿日期:2010-12-10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70971143)

作者简介:朱富强(1971—),男,江苏丹阳人,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教授,博士。

济学中,哈耶克、森、西蒙、阿克洛夫、奥斯特罗姆以及霍奇逊等经济学大家都认识到进行交叉学科研究的意义,并长期致力于这方面的探索。

不幸的是,自古典经济学后期以降,尤其是在新古典经济学取得支配地位后,主流经济学就日益与其他社会科学脱节,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开始轻视与其他社会科学的交流。事实上,现代主流经济学与数学、物理学等学科之间的联系远比与经济学其他流派和社会科学其他分支之间的联系更为紧密,其教育很少强调它与哲学、法律和历史学的关系,而是赋予数学以决定性的角色。而且,即使 20 世纪 70 年代经济学帝国主义的兴起使得经济学重新涉及社会科学其他分支的传统领域,但也没有形成真正的知识和思维契合,而是扩展了日益形式化的现代经济学研究方法。这一潮流发展的结果并没有充实和完善现代经济学,反而使之进一步形式化,其理论与现实之脱节也越来越严重。事实上,契合思维所注重的是认知的互补和沟通,而不是单向度的方法论扩张,对经济学来说,尤其必须充分认识到社会科学其他分支的某种合理性或可借鉴性。本文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梳理经济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的分离以及契合的发展历程,并在对历史上曾出现的两次契合运动进行剖析的基础上对当前的经济学帝国主义运动作一反思。

二、经济学与其他社会科学既分离又契合的历程

直到 18 世纪晚期,经济学一直被视为道德哲学的附属物,只是到了 19 世纪,部分地是针对生理学科出现的反应,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才逐渐建立起来。尤其是 1850 年以后,人们开始对一系列学科进行了界定,实现这一点的基本步骤是:首先在主要大学里设立一些首席讲座职位,然后建立一些系来开设有关课程,学生在完成课后可以获得该学科的学位。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历史学、法学、人类学、地理学以及心理学等都取得了独立的地位,并日益制度化。每一个学科都试图对本学科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差异进行界定,尤其要说明本学科与那些在社会现实研究方面内容最相近的学科之间究竟有何分别。譬如,经济学家坚持其他条件均同假设的有效性,从而便于研究市场的运行机制;政治学家仅仅关注政府行为及其结果;而社会学家则着重研究为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所忽略的新兴社会领域。显然,这些学科共同构成了称之为社会科学的知识领域。事实上,到 1945 年,组成社会科学的全部学科基本上都已经在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主要大学里制度化了。而且,随着这些学科结构的建立,围绕着研究、分析和训练,形成了一些实实在在的市场结构,产生了大量被我们今天视为现代社会科学遗产的文献(华勒斯坦等,1997)。

当然,在社会科学各分支分化的同时,并非完全没有相互契合并朝综合性方向发展的迹象。事实上,1945 年以后,各类交叉性的新兴学科开始不断出

现,如历史社会学、历史地理学、政治社会学、经济社会学、心理经济学、伦理经济学等。而且,即使在各社会科学分支独立化的进程中,也并非没有学者进行过重新契合的尝试。在社会科学发展史上一直有学者在进行契合的尝试,其中曾经掀起过两次巨大的社会科学契合风潮。一是早期由孔德倡导的社会学帝国主义运动。孔德倡导人的一般科学,认为所有社会现象都是相互依赖的,它们由相互依赖的过程联系在一起,通过这些过程,某一部门的任何深刻变化都伴随其他部门的相关变化。因此,他试图将所有社会科学统一到名为社会学的一般科学之下,强调只有包括经济的、伦理的、法律的和文化的的历史方面所表现出来的真实现象才是社会研究的真正对象。二是源于德国的历史学帝国主义运动。当时的历史学派认为,积累历史、描述真实材料的任务应该优于并且远远要比演绎推理重要得多,而一旦经济过程被孤立地、片面地进行分析就会迷失它的本质。这个流派也曾影响深远,门格尔在《德国国民经济学的历史主义谬误》的序言中写道:“历史学家像外国征服者一样一步一步踏入了我们的科学领域,给我们强加了他们的语言,他们的习惯,他们的学术用语,以及他们的方法。”^①

事实上,随着第一次经济学方法论大战的持续,历史主义和边际主义学派的共存已经得到了确认。历史学派领袖施穆勒在晚年已经悄悄地将极端历史主义的一些教条抛弃了,并开始使用一些功能性工具进行理论推理研究,甚至在价值和价格问题上还准备接受门格尔的学说。特别是施穆勒去世后,德国的历史学派也宣告结束。不过,随着论战的平息,历史专题研究的热情又恢复了常态,因此,新历史学派的研究工作仍然在施穆勒后继人物的领导下继续开展,而这些新人物在他们思想形成时期也深受施穆勒的教导和熏陶。例如,马克思·韦伯就将自己看成是施穆勒的思想后裔,不但从社会学的角度对宗教生活、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进行了深入研究,而且还将经济学和社会学融合为历史学。在韦伯看来,社会科学的研究工作与自然科学是完全不同质的。在自然科学中,解说就是如实描绘而别无他物,而社会科学中的解说却包含了对其文化内容的理解 and 对其“内在含义”的诠释。

然而,在罗宾斯和帕森斯的努力下,经济学和社会学却开始了更为剧烈的分裂。一者,罗宾斯将经济学定义为选择的科学,即它是研究为达到既定目标而进行的理性选择;二者,帕森斯在更狭隘的意义上重新定义了社会学,即它是研究社会中“共同价值整体的特征”的科学。这里可以作一梳理。

一是罗宾斯的作用。韦伯夫妇在创办伦敦经济学院时极力推崇自然科学中常用的演进主义方法,赞同历史主义的观点,强调经济学课程不能过于拘泥于形式或过度数学化,而要阐述经济和社会行为,而且,其最早任命的几位学者如侯文斯、坎南、拉斯基以及杨格等都与历史学派和制度学派存在密切联系。但是,继杨格后任伦敦经济学院院长的罗宾斯却设法彻底摆脱它所包含

的制度主义和历史主义的遗产。首先,罗宾斯把经济学界定为一门一般性的“选择的科学”,而不用去研究个人偏好和目的的心理缘由和制度塑造过程;其次,为了实现经济学科的这一转变,罗宾斯又选择性地重新包装了英国、德国、奥地利和美国在内的经济学家,把他们打扮成自己的同盟军。在英国,罗宾斯不仅忽略了马歇尔对历史问题的关注,还把马歇尔描述为历史学派的反对者,特别是从威克斯蒂德的“经济交易”定义中寻找依据。在德国和奥地利,由于门格尔创立的奥地利学派对经济学范畴的重新定义与罗宾斯很相似,并攻击德国的历史主义而支持罗宾斯的主张,因而罗宾斯主动邀请了一批流亡的奥地利学派人物到伦敦经济学院。在美国,罗宾斯刻意把奈特包装成一个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而至于奈特对制度主义的同情则隐晦不讲,尽管奈特对罗宾斯赋予自己的角色一再表达出不舒服。这样,罗宾斯就设计了一个奥地利—新古典传统,这一传统从门格尔到威克斯蒂德再到奈特,从而创造出了一个德国—英国—美国三位一体的体系。

二是帕森斯的作用。帕森斯曾经长期受到历史主义和制度主义者汉密尔顿、艾尔斯、霍布豪斯、拉斯基、托尼、马林诺夫斯基、奈特、怀特海、熊彼特等人的熏陶,因而他一直强调制度和文化在人类个性塑造中的决定性和压倒性作用。但是,当他到了哈佛大学经济系后,由于受到当时的领军人物也是《经济学季刊》主编陶西格的影响,他开始转变成为制度主义的批判者。事实上,哈佛以新古典经济学为指导的学术环境鼓励帕森斯对制度主义和历史主义采取激烈批判的态度。即使如此,帕森斯依然不能适应新古典经济学的思维方式,更没有将新古典理论研究作为自己的终生职业,而是转到了社会学系并构建了非历史的社会学体系,从而避开了制度主义和新古典主义二者择一的困境。然而,正是为了能够将文化和制度而不是本能纳入自己的分析框架,同时能够在新古典思维的主导氛围中坚持自己的研究,帕森斯开始致力于将经济学与社会学进行划分。特别是帕森斯受到帕累托对“逻辑的”和“非逻辑的”行为区分的影响,他将“逻辑”行为看作是方式与目标相一致,并且方式适合于目标,这种“逻辑”行为的研究属于经济学研究对象;而“非逻辑”行为统治了多数人类行为,这被看作是社会学的研究对象。这样,帕森斯就接受了罗宾斯的定义:经济学是理性选择的科学,而社会学的任务则是研究罗宾斯假设为决定目标的社会和规范的起源。

经济学在发展史上除了与历史学和社会学两大主要学科存在密切联系外,经济学还与伦理学、哲学、政治学、法学以及心理学之间存在密切联系。例如,早期古典经济学大师如休谟、斯密、马克思都是出身于道德哲学或法哲学领域,而奥地利学派的门格尔、庞巴维克、维塞尔、米塞斯、哈耶克乃至熊彼特等原先都是学法学的。不幸的是,后来经济学与这些学科却逐渐疏远了,这里可以对经济学与心理学之间的关系演变做一梳理。

早期心理学往往将人体看作一台机器,而新兴的心理学则将之转化从心灵的视角来看待这一机器。正是基于对这种新学科的反应,一些经济学家如弗朗西斯·埃奇沃斯、斯坦利·杰文斯借鉴了德国心理学家如古斯塔夫·西奥多·费希纳、恩斯特·韦伯以及威廉·冯特的见解,考虑了感觉、刺激以及响应之间的联系。不过,随着19世纪末20世纪初弗洛伊德开创的精神分析心理学的崛起,心理学将重点放在被压制的记忆如何影响人们的无意识行为,而对感觉、刺激以及响应等却失去了兴趣,这在很大程度上违反了早期心理学中的机械主义观点。因此,作为回应,经济学家也开始逐渐离开和无视心理学。尽管如此,直到20世纪上半叶,大多数经济学中存在的小部分心理学内容依然是19世纪的产物。例如,马歇尔、凯恩斯以及其他人的经济学中都充满了心理幻觉;同时,心理学和早期制度主义之间也存在密切联系(Rutherford,1994)。不过,与此同时也出现了针对心理学和经济学之间关系的争论,典型的论战发生在罗宾斯(Robbins,1984)和哈奇逊(Hutchison,1938)之间。后来,为了保护理性假设免受外来的批评,弗里德曼在20世纪中期引入了逻辑实证主义,这似乎成功地排除了心理学的考虑。在弗里德曼(Friedman,1953)看来,心理假设基本上与理论的有效性无关;相反,他基于工具主义认为,这些理论应该根据它们产生一般精确的预测能力来加以判断。由于弗里德曼在现代经济学界的巨大影响力,自此以后,主流经济学与心理学之间的联系也就越来越疏远了。这一趋势一直发展到20世纪80年代,经济学和心理学之间的联系重新得到认识,于是就导致了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的兴起。

三、经济学理论过度抽象化的本体论反思

正因为社会科学本身应该是统一的,因而社会科学发展史上一直有学者致力于社会科学各分支之间契合的重新努力,从而出现过几次较大的统一化运动。然而,这些统一化运动几乎都不是真正的知识契合,不是各学科之间的沟通和互补,而是往往将某一学科的观点、思维依靠其社会影响力拓展到其他领域,反而造成了知识的狭隘和僵化。事实上,这些学术统一化运动往往是建立在还原主义思维之上,它试图将复杂的事物化约为简单因素而实现学科的统一。自然科学期望将物理现象化约为普遍性的终极原理或有限数目的基本方程式,而社会科学(行为科学)则将人类行为还原为低等生物行为,甚至是物理规律。问题是人类社会并非如自然世界那样保持长期的稳定,而呈现出一种不断复杂化和高级化的趋势,这种变化往往是人类社会一直追求的理想目标。因此,这种还原主义思维会遭到强调人类社会独特性的学者的批判,由此还发展出众多的科学哲学流派,如以库恩为代表的历史学派、费耶阿本德提出的认识论的无政府主义等。

确实,在科学的发展中,我们不能低估统一性解释的重要性及其潜在价

值,但是正如霍奇逊强调的,“对统一性解释的追求不能被推进到这样一点上,即对特定解释的本质和价值不加重视。一些解释可以进行统一,但是却没有多大价值。神造万物的理论是一种统一性的解释,但是没有多大价值。同样,……不可证伪的一般性理论,例如‘每个人都追求效用最大化’,也没有多大的解释价值。”^②从某种意义上讲,正是受统一性理论巨大魅力的感召,人们开始忽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差异,忽视社会经济现象的复杂性,而且还逐渐滋生出这样一种扭曲的观点:分析不精确的一般理论比分析范畴相对狭隘的理论更好。霍奇逊写道:“一旦我们尝试建立更加精确和更有意义的解释时,就会遇到这样一个问题,即经济现实以一种与物理现实不同的方式进行变化。而一般性理论的渴望使得人们对这个关键问题视而不见”。^③于是,为了赢得尊重,经济学、社会学和人类学也努力地揭示一般性的原则,构建可能囊括几乎所有情形的理论,并刻意地使用自然科学的研究方式。

正是在理论统一和简化的思维指导下,李嘉图、萨伊、西尼尔等开始刻意地将政治经济学规律当作“社会物理学”规律、社会进化规律来规范和研究,试图把经济学建设成为一门非价值取向的、中立的“纯科学”,从而把经济学带向类似于自然科学那样的“纯理论化”发展方向。例如,西尼尔就将其理论建立在四个“不言而喻”的基本命题:收入和效用最大化原理、人口原理、资本积累原理、收益递减原理。但显然这四个基本假设并不是“不言自明”的,相反是问题重重。

亨特(2007)在《经济思想史:一种批判性的视角》一书中对西尼尔的这四个假设进行了批判:(1)他固守“效用决定价格”,认为财富在个人之间的效用不能比较,这比边沁以财富的边际效用递减为基础而提出的应当将富人财富分给穷人以增加社会总福利的理论倒退了,并且,他否认当时存在周期性经济危机,这是违反常识的。(2)他固守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认为劳动人口的贫困来源于他们的道德和智力低下,一种减少贫困“有效且永恒的方法”是“提高劳动人口的道德和智力品质”。但是,为了控制人口,让工人阶级长期生活在极端“对贫困的恐惧中”绝对是必要的,因为没有穷人的牺牲“去承受代价,那么就不会有普遍的进步产生”,这种“牺牲穷人论”显然充满了道德立场。(3)他的资本积累理论明显采用了他所反对使用的道德标准来解释经济过程。事实上,他认为,利润相对应的关系是“节欲”,是资本家进行痛苦节欲的补偿。(4)他的地租和收入分配理论否认了不同阶级收入分配的差别,认为所有收入的来源都是相同的。他写道:“阶级之间的差别,很大程度上是一种错觉。在自然的情况下,工人和雇主之间的关系是自发且友好的,他们的利益是和谐的。”^④

理论的契合和统一之所以会被扭曲,根本原因在于没有考虑不同学科在研究对象上的本质区别,如社会现象与自然现象之间的本质差异、动物的本能

行为与人类的社会行为之间的差异。事实上,抽象是当前流行的一般化理论的基本特征,相应地这些理论基本上就都是建立在被认为是共同的或普遍的特征之上,而不是历史的或文化的特性之上。但问题恰恰在于,社会经济现象本质上却是历史的产物。布劳代尔就认为,相对稳定的社会结构、心理和文化是决定现状的最深层因素。正因如此,社会科学领域中那些抽象的一般理论就丧失了人文性、本土性和时空性,而与现实越来越脱节。

霍奇逊说:“历史是重要的,这部分是由于每一个复杂的有机体、每个人和每一个社会都带有过去的痕迹。演化建立在历史残存的基础上,这些残存会阻碍当前的行动”;而且,“如果历史是重要的——至少在社会发展具有路径依赖性这个意义上——那么我们在分析问题时就必须探索过去的特定事件。”^⑤这就意味着,尽管一般性理论会达到某种程度上的统一性解释,但这种统一必须是具有相同或相似的本体。霍奇逊进一步指出,“本体性的思想建立在参照的和代表的能力之上。如果一个本体性的解释统一是可能的,那么它必然建立在一系列现象之中某一潜在的本体统一之上;它们必须共同拥有一些物质实体基础。任何现象中的解释性统一必须从调查和发现中得出,而不是纯粹地强加假设”,“既然探究隐藏在各种各样真实现象背后的潜在统一恰恰是科学的中心目标,那么任何反复发生的元素或者相似性的缺失都会对本体的统一施加限制。”^⑥

正因为本体论的统一性解释必须依赖于被调查现象之中是否存在潜在统一,因而我们在进行统一性解释的扩展时就应该有所节制;或者说,统一性的扩展应该是循序渐进而不是跳跃式发展的,应该首先出现在临近学科之间。事实上,我们可以把现实看成是由不同的实体层次组成的,最简单的可以分成物理层次、化学层次、动物层次和人类层次。当然,其中还可以进行细分,如人类层次可以根据社会性进行分类,也可以根据文化分成不同的模式。显然,统一性首先应该发生在同一层次内部。譬如,经济学首先应该与其他社会科学分支进行统一性解释,而不是与物理学或生物学进行统一。究其原因,经济学本质上毕竟属于一门社会科学,它与社会科学其他分支更接近,而不是与物理学等自然科学更接近。因此,就经济学的体系建设和理论发展而言,它更应该借鉴其他社会科学所积累的知识和研究视角,而不是自然科学的抽象思维。

事实上,任何时期的社会经济现象都具有共同的历史特性和制度结构,这是经济学的理论和思维之所以首先与社会科学其他分支相契合的基础。一方面,就行为机制而言,经济学和社会科学其他分支所研究的都是人的行为而不是物的逻辑,从而就必须对真实世界中人类行为的共同性进行探索;另一方面,就研究对象而言,经济学和社会科学其他分支所研究的对象都根植于特定的历史和制度之中,从而必须对不同社会制度的共同性进行挖掘。而且,社会科学中所体现的这种历史特性和制度结构也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迁,这也

是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重要区别。霍奇逊就指出,“社会—经济系统在过去的几千年里已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然而物质世界的本质特性和规律从大爆炸之后就没有变化过。因而社会科学的方法和步骤必须改变,以追寻不断变化的分析主体。”^⑦不幸的是,现代主流经济学却很少考虑经济学与自然科学在本体论的前提假设上的这种差异,而是简单地盲目模仿自然科学的研究思维和手段,并把自然科学中的假设推进到经济学中,结果造成了诸多似是而非的解释结论。

四、经济学帝国主义的单向度扩展之反思

我们知道,19世纪30年代孔德曾创造“社会学”这个词,并试图将整个社会科学统一起来。但是,后来社会科学内部开始出现分裂,这典型地发生在经济学与社会科学其他分支之间。究其原因,随着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变化以及经济学对纯理论发展的兴趣加强,特别是20世纪30年代以后逻辑实证主义的兴起,抽象演绎的分析思路逐渐占据了经济学的支配地位,这使得经济学逐渐向数理模型和统计分析的方向发展。不过,随着20世纪60年代、70年代后新问题的出现,经济学的研究内容不断拓宽,并导致经济学的研究工具和分析思维逐渐向其他社会科学领域渗透。这样,到了20世纪末,罗宾斯—帕森斯的定义就瓦解了,理性选择的方法论迅速侵入政治学和社会学,并且,在贝克尔、波斯纳、布坎南等人领导下,最终掀起了愈演愈烈的经济学帝国主义运动。

在现代主流经济学家看来,传统上基于“理性”和“非理性”标准对经济学和社会学的划分是不成立的,因为人的经济行为和非经济行为是不能截然分开的;同时,现代主流经济学家认为,所有的行为都可以被看成是理性的,只要我们拓宽效用的外延,所有的行为就都可以用理性选择来加以分析。例如,贝克尔指出,“人类行为不能条块分割,这种条块分割认为人类行为有时基于最大化,有时则不然;有时受稳定的偏好驱使,有时任随意的动机摆布;有时需要最优的信息积累,有时则没有这种需要。相反,所有人类行为均可被视为是某种关系错综复杂的参与者的行为,通过积累适当信息和其他市场投入要素,他们使其源于一组稳定偏好的效用达致最大”。^⑧所以,正如波斯纳指出的:“‘市场’经济学和‘非市场’经济学之间的区别正变得更难确定”。^⑨结果,就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经济学帝国主义运动。

显然,这场经济学帝国主义运动存在两个层次,而这两个层次都是单方面的。第一个层次是包括数学、物理学以及生物学等自然科学向经济学的单方向扩展,是经济学借鉴甚至搬用这些学科的基本方法,是单方向的运动,以致经济学本身日益成为应用数学的一个分支;第二个层次是在与社会科学其他分支的融合中,经济学根据自己固有的假设并将从数学搬用来的方法再一次扩展到社会学科其他分支,从而将其他科学领域也变为经济学研究的一个内

容,这也是单方面的,并且进一步抹杀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差异。正因如此,这次出现的经济学帝国主义运动与孔德所推行的社会学帝国主义运动具有共性:两者都不是不同学科互补、共通的真正契合,而是单方面的扩张。

事实上,孔德推行的是社会学帝国主义,希望用社会学这个概念和实证方法来整合和统一当时已经独立出来的历史学、法学、经济学等社会学科分支,使社会学成为各社会学科的皇后。目前流行的经济学帝国主义运动则试图将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和分析思路推行到其他社会科学领域,并最终取消所有的社会科学分支,经济学开始成为社会科学的明珠和灯塔。而且,这两次运动还有其他明显的共同特征,根本的共同点就是试图将数学引入社会科学中:孔德推动的社会学帝国主义运动的根本特征就是社会物理学运动,注重现实的实证主义分析,而割裂了传统社会学与社会制度和组织之间的渊源联系;同样,目前贝克尔发起的经济学帝国主义运动也试图通过引入数学方法以实现经济学的科学化和普遍化,这实际上也是注重现实分析,割裂了历史制度因素对人类行为的影响。

迄今所发生的这两类契合之所以都是机械的和单方向的,根本原因在于西方社会根深蒂固的自然主义思维。在自然主义思维的指导下,现代主流经济学刻意模仿在物理学、生物学以及心理学中存在的还原主义研究方法,试图通过建立一个原子式的、个体的单位构成的复合体来说明社会经济系统的复杂性。问题是,社会现象是复杂多变的,而这种研究思维根本不可能真正带来多元化的经济学发展,也不可能实现社会科学的有机统一。哈恩就曾指出,“我最为坚定的看法……是既不存在单一的、最好的方式来理解经济学,除了纯粹的逻辑演绎之外也不可能得出任何确定性的结论。自从我最初接触这门学科以来,一直令我惊讶的是这种观点并未得到广泛接受。确实,我们为热情地坚持的信仰所包围”。^⑩

尽管如此,绝大多数主流经济学家却热衷于为这种抽象的研究取向进行辩护。例如,索洛在为数理经济学辩护时就说:“我知道轮盘赌博是不正当的,但这是镇里唯一的娱乐项目。”^⑪问题是,既然现有的唯一的这种轮盘赌博的娱乐方式是不恰当的,我们就理所当然应该去探寻其他更好的替代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绝大多数主流经济学家热衷于为既有的核心假设和方法辩护,现代主流经济学迅速退化为一种狭隘的、过于抽象的、在实践上不可操作的形式主义。霍奇逊写道:“建立一般性理论的愿望迫使科学家们简化并推翻他们所努力追求的真正的一般性。人们对一般性理论的迷恋,部分地导致了在现代经济学和社会学中存在一定程度的忽略历史的现象。”^⑫结果,尽管经济学帝国主义运动气势如虹,但其实际分析现象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所暴露出来的局限性却越来越明显。譬如,现代主流经济学往往用成本—收益来分析犯罪行为,并且认为,提高惩罚力度是降低犯罪的重要措施。但显然,存

在死刑的国家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犯罪率下降,而 Frey 等(2009)的研究表明,人的犯罪行为往往受社会环境的影响。

因此,尽管当前经济学与其他社会科学似乎存在相容和契合的趋势,但是,这并不是真正的契合,而是自然科学的思维经由经济学这一中介向社会科学单方面的扩展。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学越来越为那些数理专业出身的人士所占据,经济学的研究也越来越形式化,经济学的教学大纲也越来越窄。当前社会科学界单方向的契合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越来越庸俗化,经济学理论也离现实越来越远,从而这种契合必然会失败。霍奇逊写道:“如果经济学还没有死亡,也是正在死去。经济学不管是苟延残喘,还是已病入膏肓,在目前普遍流行的经济系框架之内,其复原的希望极为渺茫。在此以外的地方、在商业界、政府和其他非学术团体内,经济学被视为一门浸淫于技术的学科,既不恰当,也不实用。这种认识已很普遍,而且还在继续扩散,具体表现在经济学学位课程入学人数的下降和转向学习诸如商业这样的相近课程”;事实上,“对现实社会经济体系的运转进行符合实际的理论和实证研究,目前已是支离破碎,分散在商学院、社会学系、地理系、技术政策系以及其他地方。对整个社会科学的学科框架和院系设置进行重组,既十分必要,也是迫在眉睫。”^③

五、简短结语

经济学的发展需要与社会科学其他分支长期所积累的知识相契合,就经济学学科的发展和进步而言,尤其需要充分吸收和借鉴其他社会科学领域的知识和思维。但是,这种契合绝不像时下流行的经济学帝国主义那样,经济学充当一个“二传手”角色,简单地把自然科学领域的数理思维贩卖给其他社会科学领域。事实上,经济学帝国主义运动所引领的统一并非是关注认知和视角的契合和折中,而是试图使研究方法的简单化和形式化。但问题是,由于不同学科本身在研究内容上存在差异,研究方法必然是无法完全一致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之间尤其如此。胡大平就指出:“方法论的建设不可能达到它的超越学科局限性目标。这是因为,这种反思(特别是直接诉诸总体性的批判)虽然直接提出学科思维的局限性(这实际上是个常识),但并没有深入到这种局限性实质的分析和批判上。在我看来,学科思维的片面性不在于主张的知识与人类社会生活的总体性相比永远是局部的,而是其无法摆脱的普遍性抱负。从全部知识史看,这种普遍性抱负也正是我们对真理的需求,它使得任何一种有效知识都不可避免地产生统一性或整体性话语的追求,即使自身处于不能胜任的境地,也产生了分裂和排他。”^④事实上,尽管苏特最早提出了经济学帝国主义的概念,但与后来主流经济学所提倡的广泛运用经济工具的经济学帝国主义不同,他坚持作为帝国科学的经济学必须丰富而不是征服其他学科,甚至依赖于其他学科,其经济学帝国主义目的是通过思想的相互融合而达到既

丰富社会学,又丰富经济学的结果。

显然,如果我们继续遵循近百年来现代主流经济学那种“科学化”道路,那么,经济学就会被迫形成一个在高度形式化和技术化的“窄门”或“栈道”中畸形发展的路线。事实上,经济学的理论发展绝不是如罗宾斯所认为的,市场经济潜在的特殊问题是适用于所有经济制度的一般性的“选择规律”;相反,需要对不同的制度类型进行挖掘,如科斯将经济学定义为研究“将经济系统链接在一起的社会制度:企业、商品和劳务市场、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金融制度、国际贸易等运作方式”的学科。^⑮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尽管当前经济学帝国主义如此声势浩大,但在西方经济学界依然有很多学者关注市场经济的维持性制度,不满意自己的研究领域和机会被追求抽象选择的数学形式主义所侵吞。例如,帕森斯就强调目标和手段不能完全分开,目标不能总是被视为“既定”的,相反,它们可能受到取得它们的过程的影响;同时,社会行为总是受到社会规范和制度规范的约束,并受其驱动,从而以此来强调意义和行为的决定机制。正是看到经济学所面临的这一危机,在1992年召开的美国经济学年会上,由英国经济学家霍奇逊和美国经济学家麦克洛斯基等组织发起并由4位诺贝尔经济学纪念奖得主莫迪利安尼、萨缪尔森、西蒙和丁伯根以及其他44位国际知名经济学家共同签署了一份“为提倡多元化和严密的经济学的呼吁书”,强烈呼吁要鼓励不同经济学流派和研究路径之间的竞争和多元化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只有经历了真正多元化的发展途径,经济学才可以更好地借鉴和吸收社会科学其他分支所积累的知识和发展的思维,才可能真正实现社会科学诸分支间的契合。

注释:

- ①转引自张国英、刘惠:《纪念一百年前的经济学方法论战》,载于J.内维尔·凯恩斯:《政治经济学的范围与方法》,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第3页。
- ②③⑤⑥⑦⑫⑮霍奇逊:《经济学是如何忘记历史的:社会科学中的历史特性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5页、第5页、第3、4页、第12页、第30页、第4页、第392页。
- ④亨特:《经济思想史:一种批判性的视角》,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18—122页。
- ⑤贝克尔:《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9页。
- ⑥波斯纳:《法律的经济分析》,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版,第905页。
- ⑩⑪⑬转引自霍奇逊:《演化与制度:论演化经济学和经济学的演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78页、第78页、第9、12页。
- ⑭胡大平:《从方法论反思到人文研究的自我批判》,《浙江社会科学》,2008年第1期。

主要参考文献:

- [1]亨特.经济思想史:一种批判性的视角[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7:118—122.
- [2]华勒斯坦,儒玛,凯勒,等.开放社会科学——重建社会科学报告书[M].北京:生活·读

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31—33.

- [3]霍奇逊.经济学是如何忘记历史的:社会科学中的历史特性问题[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 [4]Frey B S.Punishment-and beyond[J].CESIFO Working Paper, No.2706,2009.
- [5]Friedman M.The methodology of positive economics[A].Friedman M,Essays in Positive Economics[C].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3:3—43.
- [6]Hutchison T W.The significance and basic postulates of economic theory[M].London: Macmillan,1938.
- [7]Robbins L C.An essay on the nature and significance of economic science[M].New York:NewYork University Press,1984.
- [8]Rutherford M.Institutions in economics:The old and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4.

A Developing Course of Modern Economics Based on Consilience of Knowledge and Its Problems: Mistakes of the Movement of Economics Imperialism

ZHU Fu-qiang

(Lingnan College,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China)

Abstract: Consilience is the foundation of the establishment and development of theoretical system of social science. However,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economics gradually separates from other branches of social science, leading to the increasing impoverishment of economics. At the same time, current movement of economics imperialism is also unilateral. Firstly, the natural sciences, including mathematics, physics and biology, unilaterally expand into economics which learns from or even copies the basic methods of these sciences. Secondly, according to inherent assumptions, economics once again introduces the methods copied from natural sciences into other social sciences, thus incorporating other social sciences in economics. Therefore, the movement of economics imperialism is not the right way to achieve consilience; on the contrary, it gives rise to further parochialism and rigidity of economic theories.

Key words: consilience; methodology; economics imperialism

(责任编辑 金 澜)